論　　著

中日對比視角下「同性愛」概念的誕生與流變*

鄒　韻**

摘　　要

19 世紀末開始，西方性學知識傳入日本，並且在 20 世紀初經由日本傳入中國。本文全面考察了「同性愛」這一概念在日本和中國的誕生及其流變過程，填補民國同性愛歷史研究中一直被忽略的中日比較視角。

*　本文特此感謝日本名古屋大學星野幸代教授所提出的啟發性意見，亦誠摯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細緻的批評與寶貴建議。此外，本文在修改過程中亦承蒙薛梅與卜杭賓提供諸多建議，謹此一併致謝。收稿日期：2024 年 9 月 3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 年 3 月 12 日。
**　杭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日本，以 1911 年女學生殉情事件為契機，當時的報紙與雜誌開始使用「同性愛」一詞指代女學生之間的親密關係。此時也正是近代日本西方性學大量翻譯出版的時期。「同性愛」一詞合併了性學中所翻譯的「同性色情」、「同性性欲」等概念，用來指代對同性產生性欲望的「異常性欲」。1910 年代，日文「同性愛」一詞傳入中國，與這一概念一同進入中國的，是知識分子對女學生親密關係的聚焦，以及對男女自由戀愛的呼籲。20 世紀 20 年代是性學知識建構過程中的重要過渡時期。從西方性學的譯介與知識分子的討論中可以看出，中日歷史語境下的「同性愛」概念與西方有所不同。在概念誕生之初，知識分子關注的重點並非男性同性關係，而是女學生與新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並將其視為社會問題之所在。

同時期，愛德華·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的理論傳入中國，日文和英文的雙重來源使得卡本特思想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融入了不同的文化解讀與詮釋。在中國男性知識分子主導的討論下，「同性愛」概念逐漸去性別化，並在左翼思想的影響下，被重新形塑為政治連帶之情。

關鍵詞：卡本特、同性愛、性學、近代中國、近代日本

一、「同性愛」概念出現的歷史背景

現代日本所使用的「同性愛」以及中文世界所使用的「同性戀」一詞相當於英文的“homosexuality”，它指的是與同

性建立親密關係的性取向和身分認同。雖然同性愛／同性戀概念的誕生不過百年時間，但它經歷了宗教、法律、性學以及身分認同等諸多議題的交匯與碰撞。王晴鋒在《同性戀研究：歷史、經驗與理論》一書中指出，西方同性戀的歷史，經歷了從「行爲」到「身分」再到「共同體」的演變，而中國同性戀的歷史則經歷了從「男風」到「疾病」再到「亞文化」的變化。[1] 一個世紀過後的現在，無論是「同性愛」還是「同性戀」，作爲伴隨近代性學知識所誕生的概念，似乎很難擺脫醫學話語中的疾病含義。因此當下在指涉少數群體時，更常使用「同志」或「LGBT」等詞彙來表現作爲身分認同的同性戀群體。

那麼「同性愛」這一概念在中國是何時出現的呢？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要確認"homosexuality"在西方從無到有的構建過程。概觀西方有關同性戀概念的出現，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在歐洲，英文"homosexuality"一詞源於 1869 年匈牙利作家卡爾 · 瑪麗亞 · 科爾特貝利（Karl Maria Kertbeny, 1824-1882）的創造，他將希臘語中表示同性的"homo"作爲前綴，創造了"homosexualität"一詞。[2] 而該詞眞正進入醫學體系是源於醫學家克拉夫特 · 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 1840-1902）的性科學鉅作——《性的心理病》（*Psychopathia Sexualis*），埃賓將同性間的性行爲納入醫學話語，視其爲一種性倒錯的先天性疾病。1892 年，埃賓的著

1 王晴鋒，《同性戀研究：歷史、經驗與理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7），頁 12-24。

2 Jean-Claude Féray, Herzer Manfred, and Glen W. Peppel, "Homosexual Studies and Politics in the 19th Century: Karl Maria Kertben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9:1(October 1990), p. 24.

作由英國心理學家哈夫洛克・靄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譯成英語“homosexuality”，至此該詞逐漸在英語圈廣泛流傳。[3]“homosexuality”概念的誕生史，也是同性戀病理化的歷史，它源於 19 世紀以來歐洲性科學的發展。[4]

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是，同性戀病理化的背景是法律將同性性行爲視爲犯罪。在歐洲，許多國家曾將男性同性性行爲視爲犯罪。[5] 而性學的出現使得同性之間的欲望成爲一種先天性的、無法透過法律懲罰來扭轉的行爲。正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指出的，醫學話語不僅定義了「同性戀」的病理化的身分，也在此過程中塑造了同性戀者的自我認同。[6] 這種對同性戀的界定，不僅確立了「同性戀者」作爲一個主體身分，也爲 20 世紀後半期同志解放運動的興起提供了理論基礎。

然而，對比西方同性戀概念誕生的歷史，現代中國的「同性愛」概念的誕生有著不同的歷史脈絡。近代中國所使用的「同性愛」一詞出現於 20 世紀初，該詞並非來自西方的直譯，而是經由日本的譯介。我將 1910-1920 年代視爲「同性

3 David M. Halperin, *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and Other Essays on Greek Lov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67.

4 Gert Hekma, “A History of Sexology: Soci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Sexuality,” in Jan Bremmer, ed., *From Sappho to de Sade: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178-179.

5 如德國普魯士刑法典（1871 年後改為刑事法第 175 條）規定，男性之間、違反自然的猥褻行為要依照法律處決，在英國男性之間的猥褻行為（gross indecency）也被視為犯罪行為。星乃治彦，《男たちの帝国》（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66。

6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佘碧平譯，《性經驗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頁 28。

愛」概念誕生的過渡期。

在過去的研究中，學者詳細探討了近代中國「同性愛」概念的歷史演變、西方性學的譯介歷程，以及主體性身分的歷史建構。1995 年，馮客（Frank Dikötter）的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一書率先關注民國時期有關同性戀的論述。他對比西方與中國，認爲西方的性學論述創造了同性戀的主體身分認同，而中國在這個時期卻未出現類似的概念。他認爲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未能理解西方的性學理論。[7] 隨後，桑梓蘭（Tze-lan Deborah Sang）《浮現中的女同性戀》首次系統性分析了中國社會對女性同性情欲的敘述。她同樣指出民國時期的「同性愛」指涉「愛的形態或主體間關係」，而非人格類型。同時，她也批判了馮客的觀點，即「現代知識精英未能掌握西方性學」，她指出「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對同性愛的論述尤爲關注主體之間的互動和情境性」，這是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同性戀現代論述。[8] 2009 年，康文慶（Wenqing Kang）的研究拓展視角，考察了民國知識分子有關男性同性戀的話語。他同樣指出，男性同性戀被視爲國家衰敗與危機的象徵，而非個人身分認同。[9] 姜學豪（Howard Chiang）的研究則批判了以往有關同性愛主體性建構的觀點，考察了同性欲望概念在何種歷史條件下進入中國科學思維的領域，他認爲在民國時期同性戀「既是一個社會問題，

---

[7] Frank Dikötter,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143.

[8] 桑梓蘭著，王晴鋒譯，《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129、135-136。

[9] Wenqing Kang,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也是一個個人問題——一個關於人格、主體性和身分的明確問題」,「正是這一由歐洲性學引入所導向的新的眞理體系,使中國出現了一個用來表述源自西方的同性戀身分的概念空間」。[10] 至此,學界重新開始討論西方性學進入中國的特殊性與意義。蔡孟哲分析了民國時期受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家卡本特性學影響的胡秋原(1910-2004),他指出通過譯寫卡本特,胡秋原「展現出社會主義獨特的政治思考與倫理視域」。[11] 許慧琦同樣聚焦卡本特的思想,並且指出卡本特的理論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不同於「科學性學」,而是「人情性學」,而民國中國論者將其理解爲異性戀話語,隨後被同性戀疾病化所替代。[12] 許維安分析了民國時期有關女性同性戀的話語,她認爲「女同性戀論述的汙名化和疾病化,正是維繫異性戀規範穩固的關鍵」。[13]

既有研究多從西方性學影響中國的視角,討論近代中國不同於西方「同性愛」論述的思想脈絡。打破「西方/中國」、「主體化/非主體化」的二元論,討論西方性學在中國的譯介和挪用,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這正如桑梓蘭所論述的,我們不應該將中國的同性戀論述看作是「西方

10 Howard Chia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31.

11 蔡孟哲,〈自由、平等、同性愛:民國時期社會主義視野的性/別論述〉,《中外文學》,卷 51 期 1(2022 年 3 月),頁 134。

12 許慧琦,〈卡本特的人情性學及其同/異性戀論述在中國的轉譯與取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0(2023 年 6 月),頁 1-70。

13 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臺北:秀威資訊,2023),頁 166。

性學演變而來畸形、有缺陷的和未完善的中國版本」。[14] 如此一來，倘若我們想要突破「西方／中國」的二元框架，就需要從東亞，特別是日本與中國的異同來重新審視「同性愛」的誕生。換言之，從全球、東亞以及中國內部三個不同層次進行論證，才能夠更清楚地看到近代中國社會有關「同性愛」論述的特質。不僅如此，如學者劉禾在《跨語際實踐》中所提出的，我們需要考察「不同語言之間最初接觸所產生的話語實踐」[15] 也就是說，「同性愛」這一概念是如何從西方經由日語轉譯傳入中國的，這一最初歷史過程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當然，日本學界也有部分學者關注到「同性愛」的中日比較研究。2005 年清地ゆき子明確指出在中國「同性愛」概念的誕生源自同時期的日本，並分析了「同性愛」與「同性戀愛」的表述在 1980 年代逐漸轉變爲「同性戀」一詞的演變過程。然而，清地的研究僅局限於社會語言學層面的分析，未能充分探討語言變遷背後所反映的歷史動態。[16] 除此之外，白水紀子分析了從民國時期到 80 年代的有關同性戀的話語變遷，她也同樣指出了日本戰前的性學知識對於中國的影響。[17] 然而，她的分析忽略了日本在接受西方性學過程中

---

14 桑梓蘭著，王晴鋒譯，《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頁 136。

15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頁 35。

16 清地ゆき子，〈「同性愛」と「同性恋」の成立と定着：近代の日中語彙交流を視点に〉，《筑波大学地域研究》，期 34（2013 年 3 月），頁 225-246。

17 白水紀子，〈セクシャリティのディスコース：同性愛をめぐる言説を中心に〉，《アジア遊学》，期 191（2015 年 11 月），頁 214。

的流變性，同時也未深入探討在這一流變過程中，中國對同性戀話語認識的演變。

基於上述研究，本文將以中日對比的視角論述「同性愛」這一概念的誕生與流變。聚焦於中日對比，也就意味著從西方／東亞、日本／中國的多層次視角探討「同性愛」概念的生成與變遷，進一步檢視日本與中國在受西方啓發並推動情欲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呈現的異同。透過對比中日兩國對於西方性學的譯介與挪用，能夠更清楚地揭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全球知識流動中進行選擇性接受與本土化轉化。這不僅有助於拓展對近代知識變遷的理解，揭示西方性學如何被東亞不同文化脈絡所重構，也能深化「現代性」在東亞的多重面向的探討。首先，我將從性學譯介與大眾輿論兩個角度探討「同性愛」概念在日本的誕生過程。其次，我將對比日本的性學譯介，分別梳理近代中國對西方性學的譯介歷程，並具體分析「同性愛」概念如何進入公共視野。最後，我將聚焦中日兩國對卡本特的譯介，以進一步論證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異同。

本文的主要論點有二。首先，通過比較日本與中國的西方性學譯介與大眾輿論中的「同性愛」論述，可以發現相較於自古有之的男性同性親密關係，[18] 近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女

---

[18] 相對於西方將男性間性行為看作是犯罪，有關中國男性同性親密關係的司法問題，可參考以下論述。在中國，男性之間的同性性行為並不構成法律上的懲罰對象；而在日本，明治時期的「雞奸條例」雖然存在，但實際處罰案例極為罕見。陳寒非在《清代的男風性與司法》中論到，清末法律處罰男男性行為多為成年男子對男童的強姦和性暴力。另外，蘇成捷（Matthew H.Sommer）在《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中也提出，清代的法律專家將性行為導入既有的性別角色的軌道之中。但是尚未發現因自願發生雞姦而受到處罰的案例。本文

學生與新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才是知識分子熱烈討論的核心議題。當然，正如「同性愛」一詞所表明的，它並非僅指向某一特定性別。但「同性愛」最初進入公共視野，卻主要圍繞女性的親密關係展開。公眾對於女性親密關係的責難也反映了日本和中國在引入西方性學話語體系中，女性首先遭遇病理化及污名化的現象。透過中日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同性愛」概念自西方經由日本傳入中國的流變過程，「同性愛」概念不僅經歷了語境轉換，也映照出性別權力關係的重塑。在既往研究中，如：桑梓蘭、康文慶、許維安等學者分別討論女性抑或男性同性戀的歷史敘述，卻較少關注「同性愛」概念本身的性別化問題。在西方，同性戀的犯罪化與主體化歷程之中，男性始終居於核心位置。[19] 然而，在東亞，西方性學所構建的疾病污名化最先被用於規訓女性。日本與中國的「同性愛」論述，植根於近代東亞試圖融入以西方爲中心的文明現代化進程，對女性同性情欲的關注往往與男女自由

所論述的日本，學者古川誠也曾指出，明治政府效仿清朝政府於 1872 年頒布了「雞奸條令」，然而該條令僅僅實行了 9 年，1881 年條令取消，9 年間查處案例僅 20 件。此處提到的文獻請參考：陳寒非，《清代的男風性與司法》（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頁 76-79。蘇成捷（Matthew H.Sommer）著，謝美裕、尤陳俊譯，《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頁 185、262。古川誠，〈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変容：近代日本の同性愛をめぐる 3 つのコード〉，《日米女性ジャーナル》，期 17（1994 年 12 月），頁 39。

19 Jeffrey Weeks 就曾指出，1921 年英國議會曾試圖引入針對女同性戀的法律條款，類似於拉布歇修正案（Labouchère Amendment）的規定，但最終未能通過。其原因在於，女性同性戀尚未進入與男性同性戀相當的社會關注範疇，且在公共領域的可見度較低。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1989), p. 131.

戀愛、女子教育等議題交織在一起，這構成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的論述脈絡。由此可見，在「同性愛」概念誕生的歷史進程中，中國與日本的論述呈現相似性，並反映東亞特有的性／別與現代性之間的交織關係。

其次，我將聚焦中日卡本特譯介史的異同，可以看出：五四後期，中國對卡本特《中性論》的譯介與挪用促使「同性愛」論述發生轉向。在男性知識分子主導的討論下，「同性愛」概念逐漸去性別化，並在左翼思想的影響下，被重新形塑爲政治連帶之情。本文之所以要聚焦中日卡本特譯介史的異同，不僅僅因爲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卡本特的翻譯與解讀一部分受到了同時期日文譯本的影響，更是因爲在 1920 年代，卡本特的性學理論對中日兩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討論卡本特性學譯介之異同，可以窺見中日「同性愛」概念流變的分歧。如許慧琦所言：「卡本特的作品是聯繫民國時期同性戀與異性戀論述的重要思想橋梁。」[20] 此論述同樣適用於日本對卡本特著作《愛的成年》之解讀。卡本特的《愛的成年》在中日兩國的譯介中均被解讀爲「異性戀」論述，忽視了其對同性親密關係的多元性探討。相比之下，卡本特的另一部著作──《中性論》的譯介則呈現出鮮明的中日差異。在日本，該書由女性知識分子翻譯，並發表於女性解放的陣地，這一轉譯過程展現了日本女性知識分子對西方性學理論的主體性詮釋，不僅如此，近代日本的《中性論》也成爲了抵抗同性戀病理化理論的思想武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女性同性情欲的污名化。另一方面，在中國的五四後期，對《中

20 許慧琦，〈卡本特的人情性學及其同／異性戀論述在中國的轉譯與取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0，頁 5。

性論》的譯介與挪用推動了「同性愛」論述的轉向。然而，相較於日本，中國的譯介卻主要由男性知識分子主導，最終導向去性別化的解讀。在左翼思想的影響下，「同性愛」逐漸被重構爲集體性的革命情感。這種轉向，某種程度上抹除了同性情欲本身的正當性問題，將之納入更爲宏觀的政治敘事，從而使「同性愛」的性別維度與個體經驗被消解。

二、近代日本有關西方性學的譯介和「同性愛」一詞的誕生

日本「同性愛」誕生的背景應從兩個方面來把握：一方面，西方性學的翻譯與傳播構建了「同性性欲」的概念，並將對同性產生性欲視爲「變態性欲」或「性倒錯」；另一方面，在文明開化的背景下，知識分子提倡男女自由戀愛，而與之相對的同性戀愛，尤其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女校內出現的女學生之間的戀愛，則被視爲無法實現自由戀愛的異常風尚，是男女分校制度下的社會弊端。因此，本文將從性學譯介和大眾輿論兩方面探討「同性愛」概念在日本的誕生過程。

（一）近代日本性學知識中的「同性色情」／「同性性欲」

日本引入西方性學的歷史主要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875 年以《造化機論》的刊行爲契機出現的性學熱潮，學者稱這一時期爲「開化性科學」時期；[21] 第二個階段是

21 所謂「開化性科學」，源自明治維新以來的「文明開化」之說，是指明治前期日本翻譯的大量西方性科學著作，有關這一時期性科學的特點可參考上野千鶴子和小田亮。參見上野千鶴子，〈解說〉，收入小

1910 年之後的「通俗性欲學」熱潮。[22] 有關同性戀的性學主要出現在第二階段。其中，對日本同性戀的性學知識體系產生深遠影響的是性學家埃賓和靄理士。特別是埃賓，其著作在日本被譯爲《變態性欲心理》，對當時日本的性學發展及同性戀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以 1913 年該書的出版爲契機，大量以「變態性欲」爲賣點的性學書籍紛紛問世。因此，以下將圍繞埃賓著作在日本的譯介過程，考察日本引入西方性學的兩個歷史階段。

在第一階段，埃賓的著作已經被翻譯出版。原書《性的心理病》首次出版於 1886 年的德國，當時留學德國的知識分子，如：森鷗外（1862-1922）、吳秀三（1865-1932）、青山胤通（1859-1917）等人，將埃賓的理論引介至日本。[23] 隨後，從 1891 年到 1894 年，該書以連載形式刊載於日本的《裁判醫學會雜誌》（後改名爲《法醫學會雜誌》）。1894 年，該雜誌連載內容以日文《色情狂編》爲題，由春陽堂出版社正式編輯成書出版。[24]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的序文與目錄

木新造、上野千鶴子、熊倉功夫編，《風俗・性》（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 505-550。小田亮，《性》（東京：三省堂，1996），頁 19。

22 「通俗性科學」正如字面意思所示，是指進入大正時期之後的性學知識，這一時期性學知識的最大特點就是通俗化與大眾化，有關這一時期性學知識的特點，可參考古川誠，〈恋愛と性欲の第 3 帝国——通俗的性欲学の時代〉，《現代思想》，期 21 號 7（1993 年 7 月），頁 110-127。

23 Gregory M. Pflugfelder 也曾指出日本有關同性戀的知識最早源於德國。Gregory M. Pflugfelder, *Cartographies of Desire: Male-Male Sexuality in Japanese Discourse, 1600-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249.

24 クラフトエビング（Krafft Ebing），日本法醫學會譯，《色情狂編》

還曾刊載於清末的雜誌上（後述）。然而，在這一階段，儘管埃賓的理論被譯成日語，但出版後不久即遭禁售，[25] 雖然得到法學家、醫學家等專業人士的關注，但並沒有成爲通俗的大眾讀物。從題目「色情」一詞可以看出，當時漢字表記中尚未出現如今常見的「性欲」或「性」概念。「性」一詞在日語中仍主要沿用古代漢語中「本性」之意。書中涉及相關概念時，多使用「情欲」、「肉欲」或「淫欲」等漢字表記，這也反映出當時語言及性學觀念尚處於萌芽階段

埃賓的著作眞正受到關注是在第二階段。1913 年，其著作《變態性欲心理》在日本出版，譯者將“homosexualität”一詞譯爲日文「同性色情」、並將這種行爲譯爲「變態」。[26] 需要指出的是，此處的「變態」並非「形態之變化」的含義，[27] 它開始指涉性之異常的狀態。這種「變態」行爲與施虐癖、受

（東京：春陽堂，1894）。

25 有關書籍的禁售，Pflugfelder 和齋藤光的研究都有提及。據齋藤光考證，早在 1889 年森鷗外就曾發表文章「ルソウオが少時の病を診す」（盧梭診斷少年之病症）介紹埃賓的理論。之後埃賓的理論又在 1891 年到 1894 年刊載在雜誌上，可以說，雖然書籍很快遭到禁售，但是這一時期已經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可參考 Gregory M. Pflugfelder, *Cartographies of Desire: Male-Male Sexuality in Japanese Discourse, 1600-1950*, p. 284. 齋藤光，〈クラフト＝エビングの『性的精神病質』とその内容の移入初期史〉，《京都精華大学紀要》，號 10（1992），頁 154-177。有關明治末期森鷗外對於性學的介紹與文學創作，可以參考黒岩裕市，〈規範化される性愛観念とその変容——日本近代文学における男性同性愛表象〉（東京：一橋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 3 月）。

26 リヒャルト・フォン・クラフト＝エビング（Krafft Ebing），《変態性欲心理》（東京：大日本文明協会，1913），頁 229。

27 幾乎同時期的植物學、動物學等著作、教科書中，仍然可以看到諸如「昆蟲之變態」等表達，意為昆蟲形態之變化。例如：池田米太郎編，《昆虫採集保存法》（東京：矢島誠進堂，1903）。

虐癖一樣，被歸爲「色欲感覺的倒錯症」。書中討論以生殖爲目的的異性戀性欲被認爲是正常的「色情」，因無法滿足異性戀性欲而替代異性間性行爲的欲望與行爲，則被視爲一種「倒錯」。1913 年該書一經出版，遂在日本知識界引起了極大反響，「性欲」、「變態」、「倒錯」等詞彙也成爲當時流行的學術與社會用語。然而，値得注意的是，這部著作中尙未出現「同性愛」一詞。

《變態性欲心理》發行之後，許多模仿該書的著作紛紛問世。其中，紅極一時的性學博士三人組——澤田順次郎（1863-1944）、羽太銳治（1878-1929）和田中香涯（1874-1944），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了埃賓的變態性欲理論。特別是澤田與羽太二人於 1915 年出版的《變態性欲論》一書，銷量極高，甚至在當時再版了 18 次，成爲廣爲人知的性學著作。[28] 正如上述介紹，埃賓的論著最初刊載於醫學雜誌，其內容以西方醫學知識爲名被引入日本。然而，《變態性欲論》在羽太銳治和澤田順次郎的改寫下，不僅刪減了原著中大量晦澀難懂的醫學知識，還增加了眾多與日本歷史以及當下同性戀現象相關的內容，以獵奇的方式吸引讀者的關注。在這部著作中，「同性色情」、「同性性愛」、「同性性欲」、「同性間性交」等關鍵詞混雜使用，而「同性愛」一詞也偶有出現，主要用以指代女性之間的同性親密關係。與之相對，「男色」一詞則特指男性之間的同性親密關係。

綜上所述，20 世紀 10 年代，日本有關同性戀的性學知識通過對西方性學的翻譯和改寫，逐漸走入大眾視野，形成

28 羽太銳治、澤田順次郎著，《变態性欲論：同性愛と色情狂》（東京：春陽堂，1915）。

了有關同性戀的性學知識體系。「性」這一漢字表記的概念亦在此時誕生，專門指代人類所謂的「本能」的性行爲。在這一知識框架下，對同性產生性欲被視爲「變態性欲」，同性戀不再僅僅是一種行爲，而被認定爲一種先天性的精神疾病。根據性學理論，人們之所以會對同性產生欲望或與同性發生性行爲，是因爲患有先天性「性倒錯」的疾病。並且從譯詞選擇來看，“homosexualität”最初被譯爲「同性色情」，後來也出現了「同性性欲」、「同性性交」等眾多語彙，而並非更突出精神之戀愛的「同性愛」一詞。那麼，日文中「同性愛」一詞究竟又是如何誕生的呢？

（二）近代日本的女性親密關係與「同性愛」一詞的誕生

古川誠曾指出，「同性愛」一詞的誕生可以追溯到 1911 年日本女學生殉情事件。[29] 換句話說，「同性愛」一詞並非直接由西方性學知識翻譯過來的日語詞彙，而是媒體對於社會事件的關注過程中所誕生的詞語。在 1911 年該事件發生之前，男學生之間的同性戀問題就已經受到眾多知識分子的關注，如：1909 年日本文豪森鷗外的小說《ヰタ・セクスアリス》（Vita Sexualis）就描寫了男學生之間的戀愛故事，並且該小說還在 1928 年由周作人（1885-1967）譯爲中文。[30]「同性愛」一詞的誕生，以及西方性學介入社會問題討論的契機，最初是從知識分子對女學生親密關係的關注與討論中開始的。

1899 年，明治政府發布《高等女學校令》，正式將女子

---

29 古川誠，〈同性「愛」考〉，《imago》，期 6 號 12（1995），頁 201-207。

30 周作人，《周作人譯文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 8 卷，頁 501-514。

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女學生數量也逐漸增多。隨著女子教育的發展，女學生之間的親密關係也受到當時教育家的關注。1908 年，刊載在《女學世界》的文章〈女學生間的惡傾向〉指出，女學生間相愛之關係頻頻發生，女學生間的相愛是爲了追求「不滿足之滿足」，是對自由戀愛無法實現的一種反抗。並呼籲「希望盡早脫離舊時代的混淆，迎來純粹的新時代，男女關係就會恢復到自然狀態」。[31] 這一時期，在媒體中也並未使用「同性愛」一詞，知識分子更爲關注的是女子教育問題以及男女自由戀愛問題。他們認爲，正是由於男女分校，女學生之間的戀愛才成爲了男女戀愛之代替品的不良風氣，因此極力呼籲男女之間自由的戀愛交往。

1911 年 7 月 26 日，日本新瀉縣出現兩名女學生投河殉情自盡事件，該事件迅速引起當時社會的廣泛關注，並成爲媒體熱議的話題。此時正是西方性學在日本傳播的時期，以這一事件爲分水嶺，性學知識成爲解明某種社會現象的「眞理」。有關這一事件的報導，當時媒體上的一部分討論仍然延續了以往的問題意識，即認爲女學生之間的親密關係是教育上的不良風氣。教育學家們要求各學校予以重視，並呼籲男女同校和男女自由戀愛。而心理學家、生物學家及醫學家則藉由這一事件，開始積極參與女學生親密關係的討論。1911 年 7 月起，各大報紙雜誌連續刊登報導，多次使用「同性之愛」一詞作爲標題。[32] 報導中多處引述心理學家的話，

---

31 伊藤銀月，〈女学生間の悪傾向〉，《女學世界》（東京），1908 年 3 月。收入古川誠，赤枝香奈子編、解説，《戦前期同性愛関連文献集成第三巻》（東京：不二出版，2006），頁 22-23。

32 〈水死せる二美人 博士と主事の令嬢 極端なる同性の愛〉，《朝日新聞・朝刊》（東京），1911 年 7 月 31 日。收入《戦前期同性愛関

解釋同性之愛是一種疾病，得此病的女性身體會變爲男性之形態，甚至無法生育。[33] 同年 9 月，雜誌《新公論》更是設立「性欲特輯」，刊登文章〈令人戰慄的女性間的顛倒性欲〉，批評女同性戀之危害。[34]

從以上報導可知，女學生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再僅僅被視爲教育上的惡習，更是需要引起醫學界注意的精神疾病。雖然在當時，上述的性學著作《變態性欲心理》尙未出版，媒體對於性學知識的引用是片段式的，術語也尙未統一，但從性學角度解讀女學生之間的親密關係成爲話題的焦點，「同性愛」一詞的誕生與女學生和女子教育問題息息相關。

1913 年，埃賓的《變態性欲心理》一書問世。次年，女性解放運動雜誌陣地《青鞜》雜誌還刊載了靄理士的著作其中一章“Sexual Inversion of Women”，日文譯作《女性間の同性恋愛》（女性間的同性戀愛）。[35] 刊載契機是因爲《青鞜》的兩位女性創刊人之間的矛盾，作爲當時日本女性解放運動領袖的平塚雷鳥（ひらつか らいてう，1886-1971）和尾竹紅吉（1893-1966），曾因彼此之間大膽的舉措與過於親密的關係，遭到媒體的嚴厲指責。1913 年，隨著二人關係的破裂，作爲主編的平塚不僅將尾竹所書寫的性體驗刊載於《青鞜》雜誌中，還在 1914 年 4 月號的《青鞜》上刊登了

連文献集成第三巻》，頁 36。

33 〈同性の愛の研究〉，《婦女新聞》（東京），1911 年 8 月 11 日。收入《戦前期同性愛関連文献集成第三巻》，頁 37。

34 桑谷定逸，〈戦慄す可き女性間の顛倒性欲〉，《新公論》（東京），1911 年 9 月。收入《戦前期同性愛関連文献集成第三巻》，頁 43-44。

35 エリス，〈女性間の同性恋愛〉，《青鞜》（東京），1914 年 4 月。收入《戦前期同性愛関連文献集成第三巻》，頁 83-88。

靄理士的文章〈女性間的同性戀愛〉。她在前言中這樣寫道：「我最近屢屢聽到女學校的宿舍等出現同性戀愛的事情，我自己未曾親眼目睹過，更未曾經歷過，只覺得半信半疑，並沒有什麼興趣。然而近來我結識了一位婦人，她可以說是一位先天性的性顛倒者了，也正因如此我對於這個問題開始有了興趣。」[36] 她所說的這位「婦人」便是曾與自己交往的女性友人尾竹紅吉。她在文中強調自己曾被「先天性的性顛倒者」當作是「愛的對象」，因此想要通過西方的性學知識解答這一經歷。於是，她請教了當時研究西方性學的專家小倉清三郎（1882-1941），小倉向她推薦了心理學家靄理士的著作。平塚拜托編輯室的友人「野母」（坂本眞琴的筆名，1889-1954）翻譯了這篇文章，並刊載在《青鞜》雜誌上。

靄理士的〈女性間的同性戀愛〉在女性解放運動陣地《青鞜》上刊載，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正如上文所述，此時西方大量性學被翻譯爲日語，埃賓、靄理士日譯著作的出版和改寫暢銷書的發行，爲理解同性親密關係提供了「科學知識」的理論支持。知識分子對同性親密關係的討論，逐漸從原本的「教育問題」與「自由戀愛問題」，轉向「性學問題」與「醫學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同性愛」的含義也從一種社會惡習，演變爲被視爲個人的先天性疾病與身分認同。換言之，1910 年代「同性愛」、「同性戀愛」這些詞彙在日本的出現，不僅延續了明治末期關於女學生親密關係的討論，還融入了西方性學的醫學話語，將其視爲一種異常的變態性欲。

---

36 エリス，〈女性間の同性恋愛〉，《青鞜》，1914 年 4 月。收入《戰前期同性愛関連文献集成第三巻》，頁 83。

需要強調的是，「同性愛」一詞並非僅僅指涉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正如「同性愛」一詞所表明的，它並非僅指向某一特定性別。Gregory M. Pflugfelder 也曾強調，通過將男性與男性的性行爲和女性與女性的性行爲歸爲「同性愛」這一類別，這種新的分類法暗示了男性與男性性行爲和女性與女性性行爲之間的相似性，遠超過它們之間的差異。[37] 因此，本文討論上述史料的目的是爲了論證「同性愛」這一概念在最初誕生時，與當時新興的女學生、新女性等群體之間密切相關。儘管在 19 世紀末期，男性之間，特別是男學生之間的親密關係也引起了一定的社會關注，[38] 但公眾對女性親密關係的指責與責難，反映了日本在引入西方性學話語體系過程中，女性首先遭遇病理化及污名化的現象。這也揭示了與西方歷史脈絡不同的日本語境下「同性愛」概念誕生的特點。

綜上，本章從性學譯介和大眾輿論兩方面總結了近代日本「同性愛」概念的誕生。首先在 1910 年代之前，日本知識分子就開始關注西方性學理論，並翻譯出版了埃賓的《性的心理病》。與此同時，隨著日本女子教育的興起，女學生大量出現，女校中女學生之間的親密關係受到了知識分子的格外關注，教育家們批判女學生間的親密舉動，呼籲男女同

---

37 Gregory M. Pflugfelder, *Cartographies of Desire: Male-Male Sexuality in Japanese Discourse, 1600-1950*, p. 253.

38 學者前川直哉研究了日本明治時期男男親密關係。他指出，從 1900 年代女學生登場開始，學生之間的「男色」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男男之間的戀愛被邊緣化，甚至視為替代品」。換句話說，到了明治末期，曾經盛行的男男親密關係逐漸退場，而女學生之間建立親密關係的則愈來愈多。詳見前川直哉，〈明治期における学生男色イメージの変容〉，《教育社会学研究》，卷 81（2007），頁 5-23。

校，倡導男女自由戀愛。其次，以 1911 年女學生殉情事件爲契機，日本誕生了「同性愛」一詞，在報紙雜誌上人們用「同性愛」一詞指代女學生之間的異常關係。而此時也正是近代日本西方性學大量翻譯出版的時期，「同性愛」一詞合併了性學中所翻譯的「同性色情」、「同性性欲」等概念，用來指代對同性產生性欲望的「異常性欲」。再者，1910 年代之後，日本流行著各種通俗性欲論，這些著作也成爲了「同性愛」病理化的理論基礎。在 1922 年，《變態性欲》雜誌中就出現了一些自稱「男性同性愛者」的投稿，他們在雜誌中自述成長經歷、身體特徵和精神狀況，訴說所謂先天性疾病的煩惱。[39] 至此，「同性愛」概念在日本誕生、發展。直到現在，現代日語中仍然使用「同性愛」一詞指涉同性間的親密關係。「同性愛」也逐漸從一種同性之間的「行爲」轉變爲個體的身分認同。

三、西方性學在中國的譯介

下文將探討性學知識在近代中國的建構。章清在《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中所論，「19、20 世紀之交日本漸成中國攝取新知更爲重要的國度」，特別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經由日本傳入中國的西學逐漸顯現。[40] 然而，既往研究多聚焦於西方性學之於中國的影響，較少關

39 前川直哉，《男性同性愛者の社会史：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受容／クローゼットへの解放》（東京：作品社，2019），頁 27-61。

40 章清，《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 50。

注在中西思想碰撞中，日本於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中介角色。因此，本文試圖填補這一研究空白，透過比較中國與日本的性學傳播，特別是探討經由日本傳入中國的性科學，以分析近代中國「同性愛」這一概念誕生的複雜性與動態性。

本文將論證以下觀點：20 世紀 20 年代是有關「同性愛」知識建構過程中的重要過渡時期，一部分有關性的話語是經由日本而傳入中國的；同時，諸如潘光旦（1899-1967）等歐美留學回國的知識分子日益增多，許多西方性學知識亦開始直接由英語翻譯引入。因此可以說，一方面，「同性愛」一詞誕生於 20 年代，中國有關同性愛的論述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響；而在另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透過對卡本特著作的翻譯與闡釋，逐漸又發展出與日本近代同性愛論述不同的觀點。

首先，從整體來看，中國對西方性學的引入可分爲兩個時期，如唐權所述，一個是津津樂道「生殖器」的清末時期，另一個就是民國初期。[41] 從第一階段來看，如：1901 年上海就曾出版《男女交合新論》、《生殖器新書》、《傳種改良問答》、《吾妻鏡》等性學著作。此時，“sex”一詞所對應的中文漢字「性」一字的翻譯還尚未出現。這一時期的特點，楊力這樣指出：19 世紀西方的性、愛、婚姻三位一體的性規範傳入清末的中國。中國傳統社會既有的子孫滿堂觀念以及清末出現的「強國保種」意識形態，保證了作爲生殖手段的「性」的合法性。[42]

---

[41] 唐權，〈從「造化機論」到「培種之道」：通俗性科學在清末中國社會的傳播〉，《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7（2016 年 6 月），頁 7。

[42] 楊力，〈清末期の中国における性科学とジェンダー：Creative and

在清末對西方性學的引入過程中，公共輿論對於同性戀的討論較少，筆者管窺所見，埃賓的《性的心理病》在 1906 年以《色情狂病理》為題曾刊載於《雁來紅叢報》，譯者署名為情俠（生卒年不詳）。[43]《雁來紅叢報》是一部不僅限於文學，還囊括了醫學、心理學、哲學等各領域的綜合性雜誌。從題名、內容以及雜誌上刊登的目錄的中文翻譯來看，可以推測該文章翻譯自日本 1894 年刊行的《色情狂編》。然而筆者目前僅在雜誌上找到該書的總論和目錄，尚不清楚是否翻譯了全文。在總論部分，該文僅僅論述了生殖與性問題之重要性——「要之生殖一事為人間萬事之要素」，[44] 卻並未提到同性戀問題。從目錄的翻譯可得知，同性戀一詞譯為中文：「對於他性情欲減退或廢絕，對同性則情欲亢進者。」[45] 而對照日文版本，可推測中文的翻譯延續了日文的表達方式：「他性に対する情慾非常に減退したるか或は全く廃絶し之に代ふるに同性に対する情慾大に亢進せるもの。」[46] 然而，無論是該書的翻譯與刊載，還是隨後知識分子的討論，相較於埃賓在日本擁有的極大影響力，他的理論在中國清末時期並未被直接翻譯為中文，也未曾引發如同在日本那般廣泛的反響。

Sexual Science とその翻訳をめぐって〉，《中国女性史研究》，期 27（2018 年 6 月），頁 63-85。

43 德國醫學士克勒佛歐賓著，情俠譯，〈色情狂病理〉，《雁來紅叢報》（蘇州），期 7（1906），頁 4-5。

44 德國醫學士克勒佛歐賓著，情俠譯，〈色情狂病理〉，《雁來紅叢報》，期 7，頁 4。

45 唐權，〈從「造化機論」到「培種之道」：通俗性科學在清末中國社會的傳播〉，《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7，頁 7。

46 クラフトエビング（Krafft Ebing），日本法醫學會譯，《色情狂編》，頁 119。

直至第二階段，即民國初期，西方性學知識透過日本的通俗性欲論傳入中國，埃賓的理論也經由上述日本性學博士三人組的介紹與翻譯，逐步進入中國的知識場域。如：1922 年《婦女雜誌》刊載了田中香涯所著〈男性的女子和女性的男子〉、[47] 1927 年中西書局曾出版吳瑞書編譯的《同性之戀愛》等。[48] 這些理論建構了同性戀病理化的知識體系並將其通俗化，即將同性之間的性行爲看作是一種性倒錯，並將其視爲一種先天性疾病。不同於埃賓理論通過日文間接的譯介，靄理士的性心理學理論，眾多著作都是由英文直接翻譯過來的。許慧琦詳細分析了民國時期的「靄理士效應」（Ellis Effect），其中周作人、張競生（1888-1970）、潘光旦在譯介靄理士的性學著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49]

周作人於 30 年代發表過隨筆〈關於捉同性戀愛〉。文中，針對納粹德國迫害同性戀，他明確指出同性戀問題應當用醫學來解決，而非法律問題，可以推測其觀點也受到了靄理士的影響。[50] 相對於周作人對靄理士在藝術上的接受，[51]

47 《婦女雜誌》刊登的作者名字為「中田香涯」，疑為轉載時的筆誤。中田香涯著，幼雄譯，〈男性的女子和女性的男子〉，《婦女雜誌》（上海），卷 8 期 2（1922），頁 61-63。

48 羽太銳治，澤田順次郎，吳瑞書編譯，《同性之戀愛》（上海：中西書局，1927）。

49 Rachel Hui-Chi Hsu, "The 'Ellis Effect': Translating Sexual Science in Republican China (1911-1949)," in Veronika Fuechtner, Douglas E. Haynes, and Ryan Jones, eds., *A Global History of Sexual Science 1880-1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pp. 186-210.

50 周作人，〈關於捉同性戀愛〉，收入鐘叔河編，《上下身：性學・兒童・婦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頁 6-9。

51 有關靄理士在藝術、思想上對周作人的影響，戴瀟娜、劉岸偉、小川利康等學者均曾涉及。詳見戴瀟娜，《未完成的悲劇：周作人與靄理

眞正翻譯靄理士的性學著作、並爲中國同性戀的醫學視角起到重要作用的則是潘光旦。潘光旦自 30 年代起就著手翻譯靄理士的《性心理學》叢書，他於 1934 年又翻譯了《性的道德》，[52] 1944 年以《性心理學》爲題翻譯了 *Psychology 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該書直至 1949 年再版了五次，進入 80 年代後仍多次重版。40 年代之後，潘光旦一直將 homosexual 翻譯爲「同性戀」，而非當時更爲廣泛使用的「同性愛」或「同性戀愛」。[53] 根據清地的研究，在中國大陸「同性戀」一詞逐漸替代「同性愛」一詞要到 80 年代，[54] 由此可以推測，現代漢語中所使用的「同性戀」一詞及其內涵受到了潘光旦譯文的影響。

潘光旦對靄理士的翻譯與介紹，的確對民國時期乃至 1980 年代後的同性戀醫學話語產生了深遠影響。[55] 然而，若聚焦於本文討論的 1920 年代，對比日本的性學譯介情況，

士》（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2018）。此外，日本學界可參考劉岸偉、小川利康的著作。劉岸偉，《東洋人の悲哀：周作人と日本》（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1）。小川利康，《叛徒と隠士：周作人の一九二〇年代》（東京：平凡社，2019）。

52 收錄於靄理士的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ume IV ——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 的一章「Sexual Education」，後由潘光旦改名為《健康教育論》。

53 潘光旦在 1932 年所寫的文章，使用的是「同性愛」一詞（如：〈陶劉妒殺案的心理背景〉一文），而非「同性戀」，40 年代之後才逐漸統一術語，使用「同性戀」一詞。潘光旦，〈陶劉妒殺案的心理背景〉，《潘光旦文集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436。

54 清地ゆき子，〈「同性愛」と「同性恋」の成立と定着：近代の日中語彙交流を視点に〉，《筑波大学地域研究》，期 34，頁 225-246。

55 黃盈盈，〈跨國視野下的「西方性學」〉，《婦女研究論叢》，期 6 號 168（2021 年 12 月），頁 72-86。

可以發現此時中國尚未出現埃賓與靄理士關於同性戀理論的完整譯本，僅有零散的章節翻譯，或經由日本性學家的簡化與通俗化介紹。相較而言，埃賓的理論在日本得到更爲深入的傳播，並成爲 20 世紀初日本醫學界、社會輿論乃至文學創作中討論同性情慾的重要參照框架。在這樣的背景下，卡本特的著作在中國被反覆翻譯與介紹，其影響力格外值得關注。與埃賓、靄理士的醫學化、病理化視角不同，卡本特以社會改革者的身分提出「中性論」（Intermediate Sex），將同性戀視爲人類性別多樣性的一部分，並賦予其正面的社會意義。正是這種不同於埃賓與靄理士的非病理化，甚至可謂帶有解放色彩的視角，使得卡本特的思想在 20 世紀初的中國與日本，成爲知識界討論同性親密議題的重要思想資源。第五章，我將考察中日對於卡本特理論的譯介與挪用，在此之前，我先論述「同性愛」一詞在近代中國的誕生。

四、「同性愛」議題的出現及同性親密關係的討論

目前，無論是既有研究還是筆者管見所及，1912 年署名爲「善哉」（生卒年不詳）在《婦女時報》上刊登的〈婦女同性之愛情〉，[56] 可以被視爲近代中國有關同性親密關係的最早論述。那麼在中國，爲何在 1912 年這一時間提出同性愛問題呢？事實上，中國到這一時期爲止幾乎未出現有關西

56 善哉，〈婦女同性之愛情〉，《婦女時報》（上海），期 7（1912 年 7 月），頁 36-38。

方性學的同性戀討論，甚至可以說這篇文章近於「孤唱」，1910 年代都罕見有關同性愛的討論。然而，倘若結合本文所論述的日本「同性愛」一詞的誕生，就不難發現 1912 年的〈婦女同性之愛情〉也許和 1911 年日本報導的女學生殉情自殺案件密切相關。如上文所述，1911 年女學生自殺案件以來，在日文中，不同於性學所譯的「同性色情」等詞，「同性愛」一詞成爲了指代同性親密關係的詞彙，有關「同性愛」的大多論述都圍繞女學生、新女性之間的同性親密關係。例如：在〈婦女同性之愛情〉一文中，該文作者也提到了，「近時日本之女學生社會亦盛流行同性相愛之風，教育家亟欲設法撲滅之而乏良策，夫欲豫防撲滅是種惡習，其方法與手段之不易」。[57] 從文章發表的時間、作者提到的日本女學生的「同性相愛之風」，以及「情欲之顛倒」、「變態」等日本通俗性欲科學的詞彙，可以推測該文確實受到了同時代日本的影響。

如前所述，日本最初有關「同性愛」的話語與女學生問題密不可分，由於女子教育的出現，女學生之間的親密關係被看作是男女無法自由戀愛而產生的惡習。而在〈婦女同性之愛情〉中，作者同樣這樣寫道：「女子更較男子易有此風。」該文將女性間的親密關係稱爲「同性之戀愛」、「同性間之戀愛」，而將男性之間的親密關係稱爲「好男色」。[58] 該文雖然認爲這種「情欲之顛倒爲一種疾病之變常現象，對於男子缺乏愛情而反對於同性者起愛情，此實情欲之變態也」，[59]

---

57 善哉，〈婦女同性之愛情〉，《婦女時報》，期 7，頁 37。

58 善哉，〈婦女同性之愛情〉，《婦女時報》，期 7，頁 36。

59 善哉，〈婦女同性之愛情〉，《婦女時報》，期 7，頁 37。

但依舊提出解決對策：「廢除女校之寄宿舍或禁相交最善之女友同室」，以及呼籲通過教育以「掃除此弊風」、「涵養女子之品性德操」。由此可以說，近代中國最初有關「同性愛」的大眾論述延續了日本明治末期對於女學生問題的討論。

進入 1920 年代，首先有關「同性愛」的大眾論述是 1922 年刊載在《民國日報 · 覺悟》的〈性教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同性愛之討論〉。[60] 該文章提到了同年日本的新聞，即奈良女子師範學校中師生之間的「同性愛」事件。[61] 同時，文章還指出同性愛的現象「教師間，大概是小學校裏特別發達些。據最近的調查，是小學校的女教師間，這個傾向最厲害」。其中雖然也提到了「性倒錯」、「變態心理」等性學中的詞彙，但作者給出的解決方法仍然是注重性教育和「實行男女社交公開與男女同學」。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所提及的 1922 年奈良師範學校中的同性愛事件，從當時日本報紙的報導來看，日本論者大多將焦點放在當事人性倒錯的問題，並討論其男性化的外貌與舉止，[62] 而從同年中國論者李

60 李宗武，〈性教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同性愛之討論〉，《民國日報覺悟》（上海），卷 5 期 5（1922），頁 0-1。

61 1920 年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生女學生因前往女教師家中，而違反校規的事件。媒體過度關注女教師之私生活，並稱此事件為「同性之愛」事件。有關這一事件的研究，可參考鄒韻，〈大正時代における女性同性愛を巡る言說：「同性の愛」事件と吉屋信子『花物語』を中心に〉，《JunCture：超域的日本文化研究》，卷 9（2018 年 3 月），頁 74-87。

62 鄒韻，〈大正時代における女性同性愛を巡る言說：「同性の愛」事件と吉屋信子『花物語』を中心に〉，《JunCture：超域的日本文化研究》，卷 9，頁 82。

宗武（1895-1968）的論述來看，中國論者仍然關注男女社交與自由戀愛問題。當然，文章中的「同性愛」一詞雖然並非僅僅指涉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但李宗武在行文中強調了女性之間這類傾向最爲顯著，因而可以說彼時中國論者對「同性愛」問題的討論仍然聚焦於女性。

縱觀 1910 年代至 1930 年代初期，中國有關「同性愛」的話語大多圍繞女學生與女校。1914 年的文章中稱美國「相友愛」的女學生是「天地間之一大怪事」，[63] 1923 年刊載在《婦女雜誌》的文章稱，學生之間的同性愛是各學校的普遍性問題，並認爲這種問題的原因在於男女隔離。[64] 1924 年，潘光旦在《婦女雜誌》發表〈馮小青考〉，文章透過明代才女馮小青（1594-1612）的例子聚焦女性「同性愛」議題。[65] 在〈馮小青考〉的餘論中潘光旦如此寫道：「昔女子之顧影自憐以至積重難返者大率因深居簡出而絕少閨中膩友之故；其行動略較自由，交遊略較廣闊者，又多流入同性戀愛一途。是以女學興而影戀之機絕，男女同校之法行而同性戀愛之風衰。」潘光旦藉此分析馮小青的「變態性心理」，進一步呼籲「改造社會之兩性觀，實爲目前當務之急」。[66]

許維安在《被創造的疾病》中詳細分析了潘光旦的寫作背景。[67] 1922 年，當時清華大學尚未實行男女同校，彼時

---

63 周棨，〈海外艷文：不可思議之同性戀愛〉，《香艷雜誌》（上海），期 3（1914），頁 9-10。

64 晏始，〈男女的隔離與同性愛〉，《婦女雜誌》，卷 9 期 5（1923），頁 14-15。

65 該書 1927 年由新月書店邀稿擴編成書《小青之分析》，1929 又修正書名為《馮小青：一件影戀之研究》再版。

66 潘光旦，〈馮小青考〉，《婦女雜誌》，卷 10 號 11（1924），頁 1717。

67 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

就職於清華的吳景超（1901-1968）批判了校園中的同性愛，在此過程中他還徵求了潘光旦的意見。許維安指出，潘光旦當時是「清華男女同校期成委員會」的文書委員，〈馮小青考〉的寫作背景正值清華大學進行男女同校的校園改革時期。潘光旦通過分析馮小青、藉由討論女性的同性戀愛之變態性心理，呼籲男女同校，實現自由戀愛。許維安對此指出，作爲男性的潘光旦，以患有疾病的同性戀者馮小青的形象作爲警戒男學生的例證，但最終卻將監控情慾發展的責任轉移至女性身上。[68] 這樣的論述並非個例，上述引用中潘光旦在文章餘論所提到的「膩友」一詞，這與周建人（1888-1984）於 1926 年在《新女性》雜誌上的論述頗爲相似，周建人這樣批判道：「女子結同性愛的膩友」是獨身主義，是異性戀婚姻之阻礙。[69]

192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譯介靄理士時同樣也更爲關注女學生的同性愛問題。1927 年張競生所創刊的《新文化》雜誌上刊登了靄理士的《性的倒錯》（*Sexual Inversion*）一書的附錄，中文將其譯爲〈女學生的同性愛〉（原題爲“The School Friendships of Girls”）。[70] 對比英國當時男男性關係的犯罪化歷史以及上述日本《青鞜》雜誌上刊載的“Sexual Inversion of Women”，可以說在 20 年代的中國，女學生之

1940s）》，頁 50。

68 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頁 54。

69 慨士，〈広東的「不落家」和「自梳」〉，《新女性》（上海），卷 1 號 12（1926），頁 935。

70 藹理斯著，謝瑟譯，〈女學生的同性愛〉，《新文化》（上海），卷 1 號 6（1927），頁 63-80。

間的同性親密關係才是中國社會最爲關注的議題。直到 30 年代，在《玲瓏》雜誌上依舊有這樣的論述：「一女子和另一女子發生愛的關係，在摩登的女學生中間，原是普遍的現象」、[71]「獨身主義以男子爲多，而同性愛多屬女性」。[72] 又如：1933 年《給新女性的一封信》中寫道：「同性愛也只是能算是……一種少女們的捉迷藏的遊戲而已。」[73]

從上述有關「同性愛」議題的討論中可知，近代中國的「同性愛」一詞源自 1910 年代對日文的援用，早期中國有關「同性愛」的討論多提及同時期的日本。從 1910 年代到 1920 年代，日本對於同性愛的論述從男女同校之問題轉變爲性之異常、性倒錯之問題。然而從中國 1920 年代的論述來看，與日文的「同性愛」這一概念一同進入中國的，是知識分子對女學生親密關係的關注以及對男女自由戀愛的呼籲。當然，在這一時期，「同性愛」一詞並不限於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但從以上所列諸多討論中可以看出，相較於男性之間的親密關係，彼時的知識分子更關注具有現代性色彩的女學生與新女性。這一點，在先行研究也有論及，桑梓蘭就曾指出：「1920 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女同性戀尤爲著迷。」[74] 通過中日歷史的對比可知：一方面，「同性愛」概念引入中國時，日本知識分子對女性特別關注的視角也一併

---

71 陳珍玲、小雁，〈婦女：女性化的『男生同性戀愛』〉，《玲瓏》（上海），卷 1 期 8（1931），頁 260。

72 愛卿，〈獨身主義與同性愛〉，《玲瓏》，卷 2 期 77（1931），頁 1253。

73 白蕾芙，《給新女性的信》（上海：大華書局，1933），頁 118。

74 桑梓蘭著，王晴鋒譯，《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頁 42。

進入；另一方面，日本在 1910 年代開始，聚焦女性的視點從男女同校到女性的性倒錯，而中國知識分子仍然關注女性間的親密關係。許維安在論著提到：「女同性戀論述的汙名化和疾病化，正是維繫異性戀規範穩固的關鍵，此汙名化論述成爲一股推力，促使女性步入家庭。」[75] 從中日兩國有關同性愛論述的誕生與流變來看，儘管從 1910 年代到 1920 年代兩國論者對於「同性愛」的討論視角並不相同，但在異性戀規範建立的過程中，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男男性慾（male-male sexuality）在最初階段似乎並非需要警惕的社會現象。性學成爲知識分子形塑女學生、新女性的性別規範之武器。

五、卡本特理論在中日兩國的譯介

愛德華·卡本特是英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家、詩人，也是對同性戀解放運動影響深遠的思想家之一。他呼籲性的解放和婦女解放，正如傑弗瑞·威克斯（Jeffrey Weeks）所說，卡本特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將性脫離於生殖問題，這不同於靄理士所代表的實證主義的生物學研究。[76]

在中國，卡本特的思想影響了眾多知識分子，其最重要的著作就是 *Love's coming-of-age*（愛的成年）。該書從人文思想的角度論述了性解放，特別是“The Intermediate Sex”

75　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頁 166。

76　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p. 221.

（中性論）一章論述了同性戀問題。隨後，卡本特將“The Intermediate Sex”這一章加以補充，出版了單著 *The Intermediate Sex*，這也是影響近代中國有關同性戀話語的重要理論。卡本特所提出的“The Intermediate Sex”在現在可譯爲「雌雄同體」、「中性人」。他批判當時所流行的性倒錯理論，否定了將同性戀視爲先天性疾病的性學觀點，並提出同性戀愛者的特殊性。卡本特認爲從歷史、文學領域來看，這些人甚至更具有藝術天性。在其論述中，他未以性欲爲界限區分友誼與戀愛，也未像其他醫學家、心理學家一樣將異性之間的生殖視爲人之本能，相反地，他認爲對於同性產生性欲也是一種本能的欲求。卡本特所提出的同性戀的解放，需要在同性戀的犯罪化以及病理化的語境下去理解。另一方面，在中日兩國卡本特也多次被翻譯、閱讀和討論，那麼知識分子又是如何理解卡本特的理論呢？

在先行研究中，許慧琦的文章詳細分析了卡本特在近代中國的轉譯問題。她認爲中國社會對於卡本特的翻譯，窄化了「卡本特提倡人類情慾適應『性』發展的民主信念，讓該書變身爲與愛倫凱作品幾無二致的異性戀名著」。[77] 她詳細論證了卡本特論著中的人類性慾被轉譯爲了「男女兩性關係」，並提出譯者忽略或誤解了卡本特的行文，並且「內化了異性戀思維而未意識到有其他同性認同的可能」。[78] 除許慧琦的研究外，許維安在考察卡本特在中國的引介時，對比

77 許慧琦，〈卡本特的人情性學及其同／異性戀論述在中國的轉譯與取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0，頁 28。

78 許慧琦，〈卡本特的人情性學及其同／異性戀論述在中國的轉譯與取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0，頁 32。

了近代日本對卡本特的介紹與翻譯。她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指出，卡本特在日本深受女性譯者與女權運動者的關注與推崇；相較之下，《中性論》在中國的發展則呈現出一種獨具特色的經驗。[79] 而本文將補充中日比較的視角，特別是日文譯介卡本特的一手資料，分別對比《愛的成年》和《中性論》兩本書在中日譯介的異同。日本女性知識分子透過《中性論》的譯介展現出從論述客體向主體的轉變，相比之下，中國的「同性愛」概念則在左翼話語影響下，逐步被納入男性主導的政治敘事之中，這一差異反映了中日「同性愛」概念構建過程中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從下表可看出，自 20 年代初，卡本特在中國就已頗有人氣，[80] 這一時期是卡本特著作翻譯和討論的高峰期，其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展現出多重路徑。換言之，卡本特的中文版譯本既有直接從原著翻譯而來的部分，也有經由日語轉譯而來的內容。這種雙重來源使得卡本特思想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融入了不同的文化解讀與詮釋。

---

79 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頁 89。

80 中國最早介紹卡本特理論的是周作人。1918 年周作人就發表了對《愛的成年》的書評，周作人肯定了卡本特對於性欲、本能欲求的論述，並提出建立在卡本特理論基礎之上的「以自由與誠實為本，改良兩性的關係」的理想社會。毛澤東也在報紙上曾評價道：《愛的成年》是「書之重要者」。1923 年徐志摩曾在《晨報副刊》上記錄了在英國訪問了卡本特的經歷，並且寫道「嘉本特的名字應得很有人知道……他就是那本名著愛之成年的作者」。可參考以下資料：周作人，〈關於捉同性戀愛〉，收入《上下身：性學．兒童．婦女》，頁 6-9。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 年 6-1920 年 11 月）》（長沙：湖南出版社，2008），頁 541。徐志摩，〈兩位世界的老頭的來信〉，《晨報副刊》（上海），1924 年 11 月 26 日，頁 4。

表 1　卡本特在中國雜誌中的刊載

年份	刊載雜誌	譯者	題目	原題及補充
1920	《婦女雜誌》，卷 6 號 8（1920 年 8 月 5 日），頁 1-14。	正聲	中性論	*The Intermediate Sex* 的第一、二章
1923	《教育雜誌》（特集：性教育），卷 15 號 8（1923 年 8 月 20 日），頁 1-10。	沈澤民	同性愛與教育	*The Intermediate Sex* 的第四章 Affection in Education
1923-1924	《民國日報 婦女周刊》，連載於號 11（1923 年 10 月 31 日），第三版至號 33（1924 年 4 月 9 日），頁 6-7。	海燕（郭昭熙）	戀愛論	*Love's coming-of-age* 全文（翻自英語）
1925-1926	《民鐸雜誌》，連載於卷 6 號 5（1925 年 5 月 1 日），頁 1-37、卷 7 號 3（1926 年 3 月 1 日），頁 1-22、卷 7 號 5（1926 年 5 月 1 日），頁 1-17。	仲雲（樊仲雲）	戀愛的成熟	*Love's coming-of-age* 的前半部分（後收錄在出版專著中）
1929	《新女性》，連載於卷 4 號 4（1929 年 4 月），頁 513-533、卷 4 號 5（1929 年 5 月），頁 605-622。	秋原	同性戀愛論	*The Intermediate Sex* 的第三章"The Homogenic Attachment"（推測翻自英語）

表 2　卡本特著作在中國的出版

年份	出版社	譯者	題目	說明
1920	晨報社叢書第二種	後安	愛的成年	翻譯自日文版本，堺利彥譯，《自由社会の男女関係》(1915年，自由社會的男女關係，東雲堂書店)
1920	社會經濟叢書	陳望道	女性中心與同性愛	翻譯自日文版本，堺利彥、山川菊榮譯，《女性中心と同性愛》(1919，女性中心與同性愛，ARS 出版社)
1927	開明書店	樊仲雲	加本特戀愛論	無法推測譯自日文還是英文，1925-1926 年刊載在雜誌，後以著作出版。
1929	大江書鋪	郭昭熙	愛的成年	序文由陳望道撰寫，並沒有明確記錄譯自日本。然而從雜誌的該書廣告宣傳中看出，宣傳用語與 1925 年，大鐙閣出版社、山川菊榮翻譯的《戀愛論》的序文相符，可推測或許受了日文版本影響。

（一）日本與中國對《愛的成年》的介紹與翻譯

在日本，卡本特的《愛的成年》（*Love's coming-of-age*）曾多次被翻譯。1915 年由社會主義運動家堺利彥（1871-1933）譯爲《自由社會的男女關係》（《自由社会の男女関係》，東雲堂書店），[81] 1921 年由倡導社會主義婦

[81] エドワード・カアペンター（Edward Carpenter）著，堺利彥譯，《自由社会の男女関係》（東京：東雲堂書店，1915）。該書在 1925 年由文化學會出版社再次出版。

女運動的理論家、實踐家山川菊榮（1890-1980）譯作《戀愛論》（《恋愛論》，大鐙閣）出版發行，[82] 1925 年再次由英國文學學者矢口達（1889-1936）譯爲《性之榮光》（《性の栄光》，文省社）出版。[83] 這些日文版本，除了較晚出版的矢口達版本，無論是山川菊榮的譯本還是堺利彥的譯本，都有意刪除了原書論述同性戀問題的部分，即“The Intermediate Sex”這一章。

在同時期發行的日本《新社會》雜誌中，曾有讀者來信專門針對卡本特的「中性」問題進行提問，譯者堺利彥如下回答道：「對我而言，中性人之問題與當下的社會問題實在相差甚遠，我對此問題沒有什麼研究的興趣。」[84] 他明確表示同性戀問題並不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家關注的焦點，他的態度與下文將要論述的中國知識分子相較，可說日本男性知識分子對於卡本特的理論關注度並不高。

而正如日文譯本題目中的「男女關係」與「戀愛」所示，男女自由戀愛是近代日本知識分子關注卡本特的主要緣由。在日本，與翻譯埃賓的醫學家、法學家相比，翻譯卡本特作品者大多是致力於社會主義運動的有識之士。彼時正值日本女性解放運動的興起，卡本特理論的翻譯不僅促進了知識分子對性解放問題的深入討論，更爲將社會主義視角引入 20 世紀初的女性運動提供了關鍵助力。因此，在 1915 年的

[82] エドワード・カアペンター（Edward Carpenter）著，山川菊栄譯，《恋愛論》（東京：大鐙閣，1925）。

[83] エドワード・カアペンタア（Edward Carpenter）著，矢口達譯，《性の栄光》（東京：文省社，1925）。

[84] 久津見蕨村、堺利彦，〈カアペンターの中性観点〉，《新社会》（東京），巻 2 號 5（1916），頁 22-23。

《自由社會中的男女關係》中，譯者堺利彥這樣談道：「在社會主義者之間，人們對於婦女問題意見不一，而這本書也代表了我本人對於婦女問題的看法。」[85] 山川菊榮在 1921 年出版的《戀愛論》中更是寫道：「此書與《婦女與社會主義》，堪稱社會主義婦女論之雙璧。」[86] 因此可以說，無論是譯者堺利彥還是山川菊榮，他們都將《愛的成年》一書看作是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理論之基礎、男女自由戀愛、性慾之解放的重要理論。

而《愛的成年》的中文版本，首次出版是 1920 年后安翻譯自堺利彥的《自由社會的男女關係》，但無論是 1924 年刊載在《民國日報・婦女周刊》的海燕（郭昭熙筆名，生卒年不詳）譯本，還是 1926 年刊載於《民鐸雜誌》、抑或 1927 年再由開明書店出版的樊仲雲（1901-1990）版本，不約而同地將題目譯爲「戀愛論」，由此可以看出，他們似乎都受到了山川菊榮所翻譯的日文版本的影響。特別是 1925 年出版的郭昭熙翻譯的版本，該書刊載在 1930 年《文藝研究》雜誌上的廣告宣傳，這樣寫道：「這是卡氏 Love's

85 エドワード・カアペンター（Edward Carpenter）著，堺利彥譯，《自由社会の男女関係》，頁 3。

86 這裡所提到的《婦女與社會主義》是倍倍爾（August Bebel）的著作，山川菊榮由英語譯出，並於 1923 年出版。可參考：ベーベル（August Bebel）著，山川菊榮譯，《婦人論：婦人の過去現在未来》（東京：アルス，1923）。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的日文譯本也對中國學界影響頗巨，其中特別是 1927 年出版的沈端先（夏衍）所翻譯的版本對後世影響深遠，該版本以牧山正彥的日譯本為底本，同時參考了山川菊榮的譯本。可見山川菊榮對於 1920 年代當時中國婦女理論的影響不可忽視。可參考李瑞璞，〈轉譯、挪用與本土化：倍倍爾《婦女與社會主義》在華傳播與接受〉，《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第九輯（2024），頁 198。

coming-of-age 的全譯。與倍倍爾底婦女與社會主義，並爲世界婦女論底雙璧。而較之倍氏底現實的科學的，則爲理想的而有詩意的。」[87] 這句話與上述 1925 年山川菊榮翻譯的《戀愛論》的序文十分相似，可以推測中文版本的《愛的成年》雖然有英譯和日譯兩種版本，但日譯卡本特的解讀對中國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在既往的先行研究中，許慧琦詳細對照了《愛的成年》的卡本特原文和中文譯本的字詞，她指出：「四位《愛的成年》中譯者，不謀而合地將卡本特原書討論各種性別的人類性欲問題，固定爲男女間的兩性關係。」[88] 那麼，有關中文譯者的這種轉譯、誤讀是否受到了日文版本的影響呢？可對比下面的例子得到答案。

原典：We cannot fail, I say, to recognize the enormous diversity of practice which has existed over the world in this matter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89]

日文翻譯：男女関係に関する世界の習慣は、ありとあらゆる種類に亘って居ったと認めざるを得ない。[90]

此處“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翻譯爲日文「男女関係」（男女關係），類似的翻譯還出現在原文所出現的“ties”（連結）也譯成了日文「男女関係」（男女關係）。可以說，日文版本的翻譯本就「封殺了卡本特在書中宣揚多元性慾／認

---

87 〈愛的成年（廣告）〉，《文藝研究》（上海），卷 1（1930 年 2 月），頁 235。

88 許慧琦，〈卡本特的人情性學及其同／異性戀論述在中國的轉譯與取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0，頁 31。

89 Edward Carpenter, *Love's Coming-of-Age: 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 (Manchester: Labour Press, Ltd, 1894), p. 116.

90 エドワード・カアペンター（Edward Carpenter）著，山川菊榮譯，《恋愛論》，頁 148。

同的理念」。[91] 這也從另一個維度印證了許慧琦的觀點，即中文版本的四位譯者爲何「不謀而合地」將卡本特所論述的非異性戀關係轉譯爲兩性關係。從現有史料來看，中文譯本的翻譯與出版宣傳或受到了日文譯本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並非簡單的文本借鑑，而是與中國知識分子對「同性愛」以及「自由戀愛」的論述脈絡緊密相連。

（二）日本與中國對《中性論》的介紹和翻譯

下面我將考察《中性論》一書在中日的譯介。正如上文所述，堺利彥的譯本和山川菊榮的譯本都有意刪除了《愛的成年》中有關同性戀問題的部分。而卡本特的另一本著作，*The Intermediate Sex* 則討論了同性戀問題。此書的翻譯於 1914 年 5 月至 7 月連載於日本雜誌《番紅花》，該雜誌由尾竹紅吉創辦，譯者是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家山川菊榮，譯文標題爲《中性論》。[92] 隨後，該文又於 1919 年收錄在《女性中心與同性愛》一書中。[93] 原題《中性論》被改名爲《女性中心與同性愛》，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日本同性愛論述與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息息相關。

正如前文所述，1914 年 4 月號的女性解放運動的雜誌《青鞜》上曾刊登過靄理士的〈女性間的同性戀愛〉，平塚

---

91 許慧琦，〈卡本特的人情性學及其同／異性戀論述在中國的轉譯與取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0，頁 34。

92 山川菊榮在與山川均結婚之前，其舊姓為青山菊榮，翻譯《中性論》之時，署名仍然是舊姓青山。

93 該書收錄了 Lester Ward 的《Pure Sociology》（堺利彥譯）和卡本特的《中性論》（山川菊榮譯）。詳見レスター・ウォード（Lester Ward）、エドワード・カアペンター（Edward Carpenter）著，堺利彥、山川菊榮譯，《女性中心と同性愛》（東京：アルス，1919）。

雷鳥認定尾竹紅吉是「先天性的性顚倒者」，並用一篇靄理士的文章來回應尾竹紅吉。針對平塚的行爲，尾竹紅吉在雜誌中回應道：「根據卡本特的說法，同性戀愛是比異性戀愛更爲精神之物，若能將其引爲善用，則具有感化之作用。」[94] 因此，在尾竹紅吉的委託之下，山川菊榮翻譯了這部《中性論》。在近代日本，援用卡本特的理論來印證同性愛的精神性、倡導同性友愛之意義的話語也在《中性論》的翻譯出版之後逐漸興起。在以往的研究中，Michiko Suzuki 就曾論證，近代日本女性作家吉屋信子（1896-1973）就曾多次在文章中引用卡本特以論述女性之間的同性愛之精神性。Suzuki 認爲吉屋信子將卡本特所論述的古希臘男性之間的親密關係置換爲了女性。[95] 而 Sarah Frederick 也指出吉屋信子將卡本特所論述的「少年之愛」置換爲「少女之愛」。[96]

總之，在「同性愛」一詞誕生的背景下，女性知識分子對卡本特《中性論》的翻譯與闡釋影響了後來的女性解放運動家與女性作家。[97] 不僅如此，卡本特的《中性論》也成爲

94 尾竹紅吉，〈編集者室にて〉，《番紅花》（東京），1914 年 5 月。收入《戦前期同性愛関連文献集成第三巻》，頁 116-117。

95 Michiko Suzuki, “The Translation of Edward Carpenter’s *The Intermediate Sex*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in Heike Bauer ed., *Sexology and Translation: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Encounters Across the Modern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97-215.

96 Sarah Frederick, “Yamakawa Kikue and Edward Carpenter Translation, Affiliation, and Queer Internationalism,” in Julia C.Bullock, Ayako Kano, and JamesWelker, eds., *Rethinking Japanese Feminis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2017), pp. 187-204.

97 有關這一點，可以參考趙書心的研究。趙書心，〈女性解放とレスビアニズムの間：『番紅花』における女性同性愛言説をめぐって〉，

她們對抗西方性學汙名化的重要理論資源。由此可見，日本的同性愛概念經歷了從關注女學生情慾與自由戀愛，到女性知識分子在介紹卡本特作品時展現轉譯主體性的變化，反映出女性在論述中的角色逐步由客體轉向主體。

另一方面，卡本特的中性論在近代中國又是如何被翻譯的呢？首先，在《愛的成年》的翻譯中，譯者都不約而同地特意補充了日文省略的“The Intermediate Sex”這一章節。除了下文將論述的刊載於雜誌上的章節翻譯，以往研究並未發現《中性論》的全譯本，但是根據日本學者清地的研究，1920 年 6 月 7 日發行的《申報》中，社會經濟叢書第一期出版預告出現了陳望道（1891-1977）翻譯的《女性中心與同性愛》的廣告，即上文所提到的堺利彥和山川菊榮共譯的作品集。然而筆者未能找到該書。但由上述廣告推測，陳望道翻譯的《女性中心與同性愛》或許收錄了山川所翻譯的《中性論》。倘若如此，這應該是民國時期卡本特的《中性論》唯一中文全譯本。無論該史料的出版是否屬實，但至少從廣告中我們也能推測出在 1920 年代早期，同性愛一詞仍然與女性親密關係息息相關。

而《中性論》一書各個章節的翻譯，從 20 年代初期開始就多次刊載在雜誌（見表 1）。1920 年《婦女雜誌》刊載了正聲翻譯的第一、二章，正聲譯作《中性論》，該文章標題與山川菊榮版本的標題相同，可猜測該譯名也許受到了日文版本的影響。1923 年《教育雜誌》刊載了沈澤民（1900-1933）翻譯的第四章“Affetion in Education”，譯作「同性愛與教育」。譯者沈澤民是文學家沈雁冰（即茅盾，

1896-1981）之弟，[98] 沈澤民在雜誌上也寫明了自己翻譯這篇文章之動機：「我們還是極力倡導情感教育呢？還是繼續保守這種陰溝的方法？我們大膽地回想罷！我們都是學校生活底過來人！」[99] 正如引文所示，沈澤民將「同性愛」之意義置換爲學校生活中的「情感教育」，批判中國當下教育的「陰溝方法」，呼籲在學校進行性教育的必要性。換言之，沈澤民通過翻譯卡本特的《中性論》，旨在於男女分校而治的歷史背景下，強調自由戀愛的重要性，這與上文所分析的 192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女學生親密關係的關注有著共通之處，透過討論同性情欲闡述男女自由戀愛的意義。

1920 年代後期，則發生了較大的改變。1929 年《新女性》雜誌刊載了《中性論》的第三章“The Homogenic Attachment”，譯者胡秋原將題目譯作「同性戀愛論」，並明確說道：「假使能因這篇拙劣的譯文，使許多人能對於這個問題引起研究的興趣，不將它看作離奇變態，甚是看作男色、磨鏡那一類的東西，就是譯者區區的微意了。」[100]

卡本特對胡秋原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翻譯上，從 1930 年出版的《同性愛問題討論集》同樣能讓人窺見胡秋原對卡本特的解讀與闡釋。該書最初於 1929 年刊載於雜誌《北新》，後來收錄於北新書局出版的《同性愛問題討論集》中。該書

98 1920 年 7 月到 1921 年 1 月於東京留學，還曾翻譯過英國文學家奧斯卡・王爾德因同性戀而獲罪，在獄中所寫的《獄中記》。可參考白水紀子，〈沈澤民研究——五四時代〉，《横浜国立大学人文紀要第二類語学・文学》，期 40（1993 年 10 月），頁 93-113。

99 卡賓塔著，沈澤民譯，〈同性愛與教育〉，《教育雜誌》（上海），卷 15 期 8（1923），頁 10。

100 卡本特著，秋原譯，〈同性戀愛論〉，《新女性》，卷 4 期 4（1929 年 4 月），頁 526。

的另一位作者是旅日知識分子楊憂天。[101] 討論集收錄了二人對於「同性愛」的爭論，這一史料也側面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對同性愛概念的認知。胡秋原在書中所論述的「同性愛」概念是廣義上的「全人類之愛」、「同胞之愛」，在書的結尾之處，他展望道：「在將來共產主義社會中，人類必將在廣泛的同胞之愛的紐帶裏，共同攜手勞動，……」[102] 、「將來性欲與生殖是必日失其重要的，在那個時代，友情恐怕是結合人與人之間的以太。」[103]

學者蔡孟哲曾指出，胡秋原通過譯寫卡本特，「展現出社會主義獨特的政治思考與倫理視域」。[104] 可以說，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通過翻譯與討論卡本特《中性論》，拓展了源自日文的「同性愛」意涵，並賦予其新的社會連帶意義。胡秋原等男性知識分子主導的討論，將「同性愛」去性別化，從左翼思想和男性立場出發，重構了同性愛的政治性概念，在這一轉譯過程中，未見到女性知識分子的參與。而在近代日本，女性知識分子對卡本特中性論的翻譯，成爲對抗同時期汙名化同性戀話語的理論武器，在兩者對比之下，可以看出中日兩國在同性愛概念發展中的不同取向。

---

101 楊憂天曾在 1929 年的《北新》雜誌上發表文章《一九二八年的日本文藝界》，詳細介紹了日本文壇的相關情況，文末還註明「於東京」，可推測楊憂天曾旅居日本，他在討論集中或許受到了同時期日本性科學的影響。楊憂天，〈一九二八年的日本文芸界〉，《北新》（上海），卷 3 期 5（1929），頁 817-830。

102 楊憂天 、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上海：北新書局，1930），頁 190。

103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 193。

104 蔡孟哲，〈自由、平等、同性愛：民國時期社會主義視野的性／別論述〉，《中外文學》，卷 51 期 1，頁 134。

結論

本文基於中日對比的視角，透過西方／東亞、日本／中國等多層次視角，探討了「同性愛」概念的誕生與流變。

首先，1910 年代，「同性愛」一詞在近代日本誕生，一方面，在日本，西方性學被譯爲日文「同性性欲」，它被視爲一種性的「倒錯」及「變態」；另一方面，在男女分校的背景下，同性親密關係，特別是女學生、「新女性」之間的同性親密關係引起知識分子的警惕，他們呼籲男女自由戀愛。以 1911 年女學生殉情事件爲分界點，大眾輿論中誕生了最初聚焦女學生親密關係的「同性愛」一詞，1910 年代「同性愛」一詞合併了性學中所翻譯的「同性色情」、「同性性慾」等概念，用來指代對同性產生性慾望的「異常性欲」。到 1920 年爲止，從性學理論出發來解釋同性親密關係的「同性愛」這一概念基本形成。日本對於同性愛的論述也從男女同校之問題轉變爲性之異常、性倒錯之問題。

其次，在中國，同時期的 1910 年代，日文「同性愛」一詞傳入中國。與日文「同性愛」這一概念一同進入中國的，是知識分子對女學生親密關係的聚焦以及對男女自由戀愛的呼籲。1920 年代，知識分子從男女同校、男女自由戀愛的視角反覆論及女性親密關係問題。可以說，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同性愛」作爲一種新的、更具現代性色彩的詞彙，最初有關該詞的討論並非聚焦於男性同性親密關係，而是圍繞著女學生、新女性這一群體中的親密關係。在性別的權力結構下，曾經隱於地表之下的女性親密關係，隨著女性走入公共領域而浮現出來，成爲教育學家議論的公共話題。與「自

古便有」的男性親密關係相比，女性的親密關係很早便遭受到性學的「汙名化」，被視爲一種禁忌。西方性學最初的引入並非旨在定義和規訓男性的慾望，而是將女性，尤其是伴隨近代化所誕生的新女性與女學生群體的慾望，作爲知識分子關注的焦點。性學被用來監控與引導女性的慾望，使其符合異性戀規範。從性學的譯介和知識分子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在同性戀病理化的歷史中，不同於西方的、中日歷史語境之下的性別權力結構的顯現。

此外，本文還透過比較卡本特理論在中日兩國的譯介歷程，揭示了在 1920 年代後期，受左翼思想影響，女性知識分子的缺席以及男性知識分子對「同性愛」概念進行去性別化的詮釋。以胡秋原爲代表的社會主義運動家將同性愛形塑爲一種政治連帶的情感。相較之下，日本女性知識分子則更強調性別主體性，並將卡本特的理論作爲對抗同性戀病理化的重要思想武器，對女性同性情慾的汙名化提出反思與挑戰。這種差異不僅反映了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性學理論的不同詮釋，也揭示了東亞現代化進程中，性／別與自由戀愛、性／別與革命議題的複雜交織。

20 世紀 30 年代，陶劉慘案的出現使女性親密關係的討論再度成爲輿論焦點。1932 年，郁達夫在《她是一個弱女子》中再度描寫革命話語中的女性同性情慾，男作家主導下的女同性書寫似乎進一步走向汙名化。[105] 圍繞該時期對女性慾望的規訓與「同性愛」議題的探討，將是筆者未來的研究方向。

---

[105] 郁達夫，《她是一個弱女子》（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 3-149。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一）中文

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 年 6-1920 年 11 月）》。長沙：湖南出版社，2008。

卡本忒著，郭昭熙譯，《愛的成年》。上海：大江書鋪，1929。

加本特著，樊仲雲譯，《加本特戀愛論》。上海：開明書店，1927。

白蕾芙，《給新女性的信》。上海：大華書局，1933。

羽太銳治，澤田順次郎，吳瑞書編譯，《同性之戀愛》。上海：中西書局，1927。

后安譯，《愛的成年》。上海：晨報社叢書，1920。

周作人著，鐘叔河編，《上下身：性學・兒童・婦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周作人，《周作人譯文全集》，第 8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郁達夫，《她是一個弱女子》。北京：中華書局，2017。

楊憂天、胡秋原，《同性愛問題討論集》。上海：北新書局，1930。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二）日文

エドワード・カアペンター（Edward Carpenter）著，堺利彥譯，《自由社会の男女関係》。東京：東雲堂書店，1915。

エドワード・カアペンター（Edward Carpenter）著，山川菊榮譯，

《恋愛論》。東京：大鐙閣，1925。

エドワード・カアペンタア（Edward Carpenter）著，矢口達譯，《性の栄光》。東京：文省社，1925。

クラフト＝エビング（Krafft Ebing），日本法醫學會譯，《色情狂編》。東京：春陽堂，1894。

リヒャルト・フォン・クラフト＝エビング（Krafft Ebing），《変態性欲心理》。東京：大日本文明協会，1913。

レスター・ウォード（Lester Ward）、エドワード・カアペンター（Edward Carpenter）著，堺利彥、山川菊榮譯，《女性中心と同性愛》，東京：アルス，1919。

ベーベル（August Bebel）著，山川菊榮譯，《婦人論：婦人の過去現在未来》。東京：アルス，1923。

古川誠、赤枝香奈子編、解說，《戦前期同性愛関連文献集成第三巻》。東京：不二出版，2006。

池田米太郎編，《昆虫採集保存法》。東京：矢島誠進堂，1903。

羽太銳治，澤田順次郎，《変態性欲論：同性愛と色情狂》。東京：春陽堂，1915。

（三）西文

Carpenter, Edward. *Love's Coming-of-Age: 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Sexes.* Manchester: Labour Press,Ltd., 1894.

二、報刊

《女學世界》（東京），1918。

《文藝研究》（上海），1930。

《北新》（上海），1929。
《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2。
《民國日報・婦女周刊》（上海），1923、1924。
《民鐸雜誌》（上海），1925、1926。
《青鞜》（東京），1914。
《玲瓏》（上海），1931-1933。
《香艷雜誌》（上海），1914。
《晨報副刊》（上海），1924。
《婦女雜誌》（上海），1920、1922、1923、1924。
《婦女時報》（上海），1912。
《婦女新聞》（東京），1911。
《教育雜誌》（上海），1923。
《雁來紅叢報》（蘇州），1906。
《朝日新聞・朝刊》（東京），1911。
《番紅花》（東京），1914。
《新文化》（上海），1927。
《新女性》（上海），1926、1929。
《新社会》（東京），1916。
《新公論》（東京），1911。

三、專書

（一）中文

王晴峰，《同性戀研究：歷史、經驗與理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7。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佘碧平譯，《性經驗史》。

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桑梓蘭著，王晴峰譯，《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章清，《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陳寒非，《清代的男風性與司法》。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
許維安，《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臺北：秀威資訊，2023。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
戴瑡娜，《未完成的悲劇：周作人與靄理士》。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2018。
蘇成捷（Matthew H.Sommer）著，謝美裕、尤陳俊譯，《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

（二）日文

小川利康，《叛徒と隠士：周作人の一九二〇年代》。東京：平凡社，2019。
小田亮，《性》。東京：三省堂，1996。
星乃治彦，《男たちの帝国》。東京：岩波書店，2006。
前川直哉，《男性同性愛者の社会史：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受容／クローゼットへの解放》。東京：作品社，2019。
劉岸偉，《東洋人の悲哀：周作人と日本》。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1。

（三）西文

Dikötter, Frank.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Halperin, M.David. *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and Other Essays on Greek Lov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Howard Chia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Kang, Wenqing.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flugfelder, M. Gregory. *Cartographies of Desire: Male-Male Sexuality in Japanese Discourse, 1600-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Weeks, Jeffrey.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1989.

四、論文

（一）中文

李瑞璞，〈轉譯、挪用與本土化：倍倍爾《婦女與社會主義》在華傳播與接受〉，《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第九輯，2024，頁 195-212。

唐權，〈從「造化機論」到「培種之道」：通俗性科學在清末中國社會的傳播〉，《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7，2016 年 6 月，頁 1-94。

許慧琦，〈卡本特的人情性學及其同／異性戀論述在中國的轉譯與取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0，2023 年 6 月，頁 1-70。

黃盈盈，〈跨國視野下的「西方性學」〉，《婦女研究論叢》，期 6 號 168，2021 年 12 月，頁 72-86。

蔡孟哲，〈自由、平等、同性愛：民國時期社會主義視野的性／別論述〉，《中外文學》，卷 51 期 1，2022 年 3 月，頁 131-162。

（二）日文

上野千鶴子，〈解說〉，收入小木新造、上野千鶴子、熊倉功夫編，《風俗・性（日本近代思想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 505-550。

古川誠，〈恋愛と性欲の第 3 帝国——通俗的性欲学の時代〉，《現代思想》，期 21 號 7，1993 年 7 月，頁 110-127。

古川誠，〈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変容：近代日本の同性愛をめぐる 3 つのコード〉，《日米女性ジャーナル》，期 17，1994 年 12 月，頁 29-55。

古川誠，〈同性「愛」考〉，《imago》，期 6 號 12，1995，頁 201-207。

白水紀子，〈沈澤民研究——五四時代〉，《横浜国立大学人文紀要第二類語学・文学》，期 40，1993 年 10 月，頁 93-113。

白水紀子，〈セクシャリティのディスコース：同性愛をめぐる言説を中心に〉，《アジア遊学》，期 191，2015 年 11 月，頁 211-223。

前川直哉，〈明治期における学生男色イメージの変容〉，《教育社会学研究》，號 81，2007，頁 5-23。

齋藤光，〈クラフト＝エビングの『性的精神病質』とその内容の移入初期史〉，《京都精華大学紀要》，號 10，1992，頁 154-177。

清地ゆき子，〈「同性愛」と「同性恋」の成立と定着：近代の日中語彙交流を視点に〉，《筑波大学地域研究》，期 34，2013 年 3 月，頁 225-246。

黑岩裕市，〈規範化される性愛観念とその変容──日本近代文学における男性同性愛表象〉。東京：一橋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 3 月。

楊力，〈清末期の中国における性科学とジェンダー：Creative and Sexual Science とその翻訳をめぐって〉，《中国女性史研究》，期 27，2018 年 6 月，頁 63-85。

趙書心，〈女性解放とレスビアニズムの間：『番紅花』における女性同性愛言説をめぐって〉，《名古屋大学人文学フォーラム》，期 5，2022 年 3 月，頁 103-118。

鄒韻，〈大正時代における女性同性愛を巡る言説：「同性の愛」事件と吉屋信子『花物語』を中心に〉，《JunCture：超域的日本文化研究》，卷 9，2018 年 3 月，頁 74-87。

（三）西文

Féray, Jean-Claude, Herzer Manfred, and Glen W. Peppel. “Homosexual Studies and Politics in the 19th Century: Karl Maria Kertben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9:1, October 1990, pp. 23-48.

Frederick, Sarah. “Yamakawa Kikue and Edward Carpenter: Translation, Affiliation, and Queer Internationalism.” In Julia C.Bullock, Ayako Kano, and James Welker, eds., *Rethinking Japanese Feminis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7, pp. 187-204.

Hekma, Gert. “A History of Sexology: Soci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Sexuality.” In Jan Bremmer, ed., *From Sappho to de Sade: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173-193.

Hsu, Rachel Hui-Chi. “The ‘Ellis Effect’: Translating Sexual Science in Republican China (1911-1949).” In Veronika Fuechtner, Douglas E. Haynes, and Ryan Jones, eds., *A Global History of Sexual Science 1880-1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pp. 186-210.

Suzuki, Michiko. “The Translation of Edward Carpenter’s The Intermediate Sex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In Heike Bauer ed., *Sexology and Translation: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Encounters Across the Modern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97-21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Same-Sex Love" in China and Japan

ZOU Yun *

Abstract

At the close of the 19th century, Western sexological theories were introduced to Japan, and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se ideas were transmitted from Japan to Chin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dōseiai* 同性愛（same-sex love） in both Japan and China, addressing a gap i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same-sex love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By adopting a Sino-Japanese comparative approach,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a previously overlooked aspect of the discourse.

In Japan, the 1911 suicide of a female student became a pivotal moment in the cultural shift surround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leading to the use of *dōseiai* in print media to describ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emale students. This period also saw an extensiv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Western sexological texts, *dōseiai* was gradually associated with terms such as *dōsei shikijyō* 同性色情（same sex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pornography） and *dōsei seiyoku* 同性性欲（same-sex sexual desire）, concepts borrowed fromsaid writings, thereby being linked with "abnormal sexual desire".

In China, during the 1910s, the Japanese term *dōseiai* was introduced as *tongxing'ai* 同性愛,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female students and calls for the advocacy of free love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1920s became a cru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sexological knowledge.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sexology and the discussions by intellectual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ncept of "homosexuality" in the Sino-Japanese context differed from its Western interpretation. Initially, the focus was not 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hips, but rather on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emale students and new women, which were regarded as social issues.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ories of 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where the dual sources of Japa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blending of differen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of Carpenter's though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le intellectuals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homosexuality" gradually underwent a process of de-genderization, and receiving the influence of leftist thought, it was reshaped into a solidarity-based political sentiment.

Keywords: Edward Carpenter, same-sex love, sexology, modern China, modern Japan